

社會網路位置類型分析

——以七十八年台北市南區立委選舉為例*

蔡佳泓**

《本文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七十八年台北市南區立法委員選舉中，選民所處的社會網路對於投票選擇的影響。作者認為，若依照選民的社會網路位置加以分類，有助於我們從另一角度了解選民的政治參與以及政治態度。因此，本文依照台北市南區選民是否有受到他人動員將選民分成動員者、不被動員者以及被動員者。本文發現這三種選民在人口特徵上並無差異，但是在社會態度上有積極參與以及消極參與之分別。進一步分析選民的政治參與政黨選擇，我們發現動員型選民的政治參與程度最高，不被動員型最低，而動員型選民較偏好國民黨，被動員型較喜歡民進黨，不被動員型則意向不明。由此可知，在這一群選民之中存在一種垂直的社會網路。

根據以上的分析，本文對於台北市南區近年來的政黨體系變遷進行初步的探討。由於有一大部份的選民並沒有強烈的政黨認同，他們的政治資訊又少，因此他們有可能被政治菁英以及相應的政治議題所吸引，改變其投票選擇對象。

關鍵詞：社會網路、動員、投票選擇、政黨體系

* 本文曾於台灣政治學會第二屆年會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經修改後投稿。蒙研討會上評論人黃秀端教授以及兩位匿名的文章評審對本文的指正，促使作者重新改正許多地方，在此一併致謝。另外感謝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提供許多寶貴的研究資料以及研究資源，包括老師與同學們的寬容與鼓勵，尤其是林錫興先生與謝雲嬌小姐與筆者討論時所給予的指導。

** 政大政治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壹、前言

古典自由主義提倡人是獨立且與生俱來人人平等的個體，每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選擇生活方式，並且共同決定公眾生活的規範。自由主義主張，每個人皆應自主地且積極參加公眾的生活，不受他人的影響或扭曲。然而，在實際生活中，每個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時時參與政治，對於政治的了解往往來自周遭環境；另一方面，個人的偏好並非完全與他人無關，可能受到來自父母或朋友的影響。所以，個人的政治偏好是由個人及外在的環境所共同決定的，人與人的互動可能影響人對政治的看法，因此，每個人皆是獨立的個體此一假設，並不能適切地放在實然的政治觀察上，許多宣稱其獨立做出決定的人，是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他人的影響。因此，在我們研究政治態度的時候，若無適當地分析民眾到底受到那些外在的影響，可能很難完全找出政治態度的差異來源。同樣地，我們無法了解有多少人影響了其他人的決定。

以人際關係影響做為投票行為的解釋，早已為西方學者所注意。他們認為，個人接受政治訊息的能力不一，所以選民必須依賴各種媒體協助他們做決定。此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也會影響個人的行為態度，例如各種「初級團體」(primary group)對於個人的政治態度的影響。所以，外在環境對投票行為的影響應是值得肯定的。以往的投票行為研究，由於受到社會心理(social psychology)模式的影響，研究者多半關心個人內在的心理，較少重視人際關係的影響。但是在許多學者的眼中，個人周遭環境對投票的影響並不完全被社會心理途徑或是價值分歧(value cleavage)途徑所解釋。社會心理途徑往往無法解釋社會心理的來源，而價值分歧途徑的解釋亦無法適應越來越價值多元的社會。相反地，人際影響不僅可以解釋社會心理的來源，而且可以用團體活動強度的看法解釋何以個人仍會部份地參照團體的立場(Flanagan, 1991:143-147)。因此，本篇論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即是從人際關係影響選民行為的理論出發，探討我國選民的人際網路位置型態，以及其對投票方向的影響。

貳、文獻檢討：何謂社會網路的概念

最先提出人際影響政治態度的理論是Lazarsfeld等人(1944)。由於他們是以傳播理論為基礎研究選舉行為，因此他們視各種社會團體對個人的影響為政治傳播的一部份，認為在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中，選民的社會團體屬性與選舉期間的各種刺激交互作用，可能使得選民的投票方向發生改變。他們對於社會網路概念的主要貢獻是，他們首先注

意到選民相信口語傳播甚於大眾媒體，而且他們提出『意見領袖』與『意見接受者』兩種選民類型，描述政治資訊的傳遞過程為：「意見領袖先接收到自大眾媒體傳來的消息，然後再告訴意見接受者」。

在另一本同樣以一個地區的居民做為研究對象的著作中，Berelson等人(1954)再次確認了家人、朋友與同事等社會關係中，容易形成同質性的政治態度。另一方面，Berelson等人指出，人們喜歡與社會地位、年齡、職業相仿的人討論政治，但是政治興趣低者較易聽從政治興趣高者的意見；也就是說，政治興趣高的選民創造了一個環境，而政治興趣低的選民使自己適應這個環境。

不同於Lazarsfeld等人以個人社會背景差異決定投票方向的方法，Converse (1962)提出政治資訊多寡影響其投票方向的穩定程度，而政治資訊包括與他人的討論。Converse認為，當短期的刺激足夠強大時，會改變一個人的政黨傾向。不同選舉有不同強度的刺激，選民之間亦有不同的政治資訊吸收能力。Converse發現，訊息越少的人越不易改變其政黨投票方向，也就是根據原來的政黨傾向投票。雖然Converse並未確定政治訊息多者何以容易改變其投票方向的原因，但是對於政治訊息少的人，他的解釋是這些選民的政治資訊不足，所以他們不會改變決定。Converse還發現教育普及雖然使得民眾很少不看報，但是他們並不一定從報紙上吸收足夠的政治資訊。教育程度較低的民眾仍相當依賴非正式的媒體，例如口語；相對的，教育高的民眾的訊息來源則是報章雜誌。

Converse對於政治資訊、投票方向及討論政治三者關係的討論，是將社會網路放在自變項的位置，而政治資訊則是中介變項：討論政治越多則擁有越多政治資訊，政治資訊越多會使得投票方向越可能有變化。也就是說，政治資訊是社會網路所造成的影響之一，而政治資訊的多寡變化將影響選民的投票取向是否發生變化。Converse的發現提供了一個可能影響投票方向的變數，即政治資訊的多寡。Lazarsfeld等人則較注重各種社會關係與訊息傳遞過程的內容本身對投票行為的影響，因而開啓了許多這方面的研究¹。

近幾年的研究將社會網路對投票的影響更加細緻化。Flanagan(1991)研究日本選民的行為發現，社會網路影響選民的政治參與與投票方向。他將選民分成意見領袖、被動員者、不被動員者，分析他們之間存在著政治知識與政治興趣的差異，而且社會網路具有促進選民投票、轉化選民的政治傾向、建立政治態度等作用(Flanagan, 1991)。Flanagan的發現幾乎完全印證Lazarsfeld等人在四十年前的理論，這是因為在日本社會上下存在一種重視人際關係的文化，每個選民都會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是透過候選人、工作場所、意見領袖所傳達的，而這正是西方國家較少見的現象。Richardson(1991)則分析政黨認同、候選人偏好與社會網路對投票的影響時發現，當社會網路的影響

與個人內在的心理取向相衝突時，社會網路的影響屈居下風。他認為，社會網路的作用是加強而非轉變個人心理的取向（Richardson, 1991:364）。

綜合以上幾位學者的研究，我們可以確定選民的投票行為部份受到社會網路動員的影響，學者們的關心主題是：那些人會受到影響？影響程度有多高？這些問題在台灣，應有探討的必要。我們認為，由於台灣社會也類似日本重視人際關係，所以社會網路動員對於投票決定應該有相當的影響，例如在選舉期間，經常有候選人推出「耳語部隊」的動員方式。如果選民常接受到偏向某一政黨的訊息，便應該會偏向該政黨。然而，如果選民並沒有常接觸來自社會網路的訊息，他們可能會根據原有的心理因素投票。但是，究竟有那些人會被影響？被影響的程度又有多高？這兩個問題需要相當程度的努力來加以解答。

而在國內，以社會網路動員解釋投票行為的研究，已有初步的成就，在此我們就幾篇較近的論文做一評估（見表1）。

在表1所列的四篇論文中，學者均相當肯定社會網路或社會脈絡因素對投票行為的解釋力，很可惜的是，在國內的研究中，並沒有如Flanagan一般完整地描述完整的社會網路動員機制，例如陳陸輝以眷村做為社會網路的分析對象，他也提及選民會投給周遭信任的人所推薦的人選，但是只談到黃復興黨部的組織架構以及輔選所支持的候選人的做法（陳陸輝，民84:48-58），並未細緻地分析為何村里組織能夠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使得社會網路對於選民的影響機制停留在表面在陳述層次。陳明通則是以選民的消息來源做為選民的人際網路動員影響來源，但是他只有探討接受訊息的程度，並沒有沒有探討選民在社會網路中的活動以及為何會受到影響。另外，在解釋的對象上，國內的研究主要以投票方向為主，然而並未關照到社會網路以外的變項如議題立場或政黨認同等，這些變項的解釋力從社會網路動員對投票方向的解釋力中剔除，使得我們雖然了解動員對投票方向的影響，但是我們並不知道被網路動員的選民，他們的其他政治態度及其對於投票決定的影響有多高。最後，我們並沒有看到將為人拉票的行為放入分析架構中²，而只是純粹地分析被拉票者的行為，使得被拉票的過程並未被完全呈現，亦即拉票的成功關鍵——拉票者的影響力來源——並沒有被真正凸顯出來。

表1 最近幾年社會網路動員相關論文一覽表

作者	盛杏媛 (民80)	陳陸輝 (民84)	陳明通 (民84)	黃秀端 (民84)
主題	社會系絡與選民的投票行為	中國國民黨黃復興黨部輔選效果之研究	社會關係網路與投票取向：民國八十二年台中市長選舉的分析	選民為何參與競選活動
研究對象	民國七十八年三項公職人員選舉，台北市北區與台北縣選民	台北市北區眷村投開票結果	八十二年台中市長選舉	八十三年省市長選舉
資料來源	國科會研究計畫：「台灣地區選民的投票行為：一個理論模式的探索」，計畫編號：NSC79-0301-H004-12	八十一年台北市立委選舉投開票紀錄、立委候選人競選行為及眷村所在里	國科會研究計畫	國科會研究計畫：「選舉行為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三）：從八十三年省市長選舉探討」
樣本	台北市北區為720，台北縣為880	(不適用)	797	1369
研究假設	選民討論選舉、里鄰關係、閱報習慣、注意選舉新聞等社會系絡因素與投票方向有關	社會系絡(居住眷村)影響候選人在眷村的得票率高低	採用「自身中心網路」概念，將選民與「他人」的關係由親而疏分為七類人際網路，分析其特徵與投票方向	個人背景因素、動員因素、團體意識及心理涉入感動選民參與競選活動之影響
研究發現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選民討論選舉的多寡與投票方向無關，但是與是否投給國民黨配票候選人有關 里鄰關係越高，越傾向投給國民黨配票候選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由於黃復興黨部的提名，使其候選人在眷村居民越多的投開票所，所獲選票越多 黃復興黨部的組織力量強，候選人可以透過人際網路動員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年齡、性別、籍貫、教育程度、家庭階層、居住眷村等基本特徵與人際網路有顯著關聯 人際網路動員與投票方向相關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選民的參與活動以投票最多，為人拉票居次(12.1%) 與其他因素相比，動員因素及心理涉入感的影響較高

我們認為，完整的社會網路動員分析過程是：我們必須先了解那些人會被社會網路動員？他們的政治態度是否會因網路動員而發生變化？這套過程隱含的假設是：選民是否進入和進入那一種政治傾向的社會網路是隨機的，與選民的政治態度無關，但是和選民的政治興趣有關。換句話說，假如選民並沒有高政治興趣，可能根本不會進入社會網路；反之，有高政治興趣的選民會佔據較高的社會網路位置。因此，本文的第一項分析重點在於：了解社會網路中的動員者、不被動員者以及被動員者三者的基本特質，例如政治興趣、投票習慣以及政黨認同等。第二項分析重點才是了解三種類型選民的投票決定。限於資料，我們無法徹底分析社會網路動員的效果，這是因為我們並沒有充分資料可以顯示選民接受到那方面的政治資訊，又是否遵照這些資訊而投票。我們的假設是，不同網路位置的選民有不同的政黨認同的強度，因而產生不同的投票選擇。最後，我們嘗試用台北市南區的政黨生態變化情形，來說明社會網路的動員過程與效果。此一了解社會網路成員角色的分析，我們稱之為「社會網路位置分析」。

以下我們將使用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在民國七十八年執行的國科會研究計畫：『台灣地區選民的投票行爲：一個理論模式的探索』（計畫編號：NSC79-0301-H004-12）的資料，以台北市南區做為分析的素材。這筆資料共有選前面訪及選後電訪兩部份。我們採用這筆資料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因為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曾經在民國八十一年又針對台北市南區的立委選舉，做了一次調查研究，所以我們不僅擁有台北市南區一地的為數可觀的樣本數，而且可以比較不同年度的選舉資料。第二，由於我們的分析對象限制在台北市南區，所以我們可以觀察該地的政黨生態的變化。例如Berelson等人研究Elmira郡即指出，屬於多數的共和黨人較能吸收屬於少數的民主黨人的選票(Berelson, Lazarsfeld and McPhee, 1954:100)。不過，這樣做的缺點在於，我們的發現只限於台北市南區的選民，無法推論全台灣地區的選民的行爲。

參、資料分析

民國七十八年的立委選舉，為解嚴之後的第一次立委選舉，也是民進黨成立後的第二次選舉，選舉結果意義非凡。在向為全國新聞焦點的台北市，南北二區的立委選舉競爭非常激烈，國民黨提名八人參選，民進黨亦提名三人參選，共同角逐六席的名額。

由於選戰激烈，因此各候選人無不努力創造話題提升知名度，國民黨更是發揮平日的組織動員努力，為每個提名的候選人配票。選舉結果，國民黨共得四席，民進黨共得兩席。國民黨佔多數席次的政治生態只維持到八十一年選舉，而且其後兩次的立委選舉，國民黨的得票率一直下滑（見表2）。諷刺的是，在今年的選舉中，配票戰術使民進黨

及新黨的候選人大獲全勝，國民黨反而淪為少數黨。可見台北市南區的選民的政黨認同情形仍在轉變中，社會網路動員的可能趨勢值得我們注意。

表2 民國78年、81年及84年北市南區立委選舉各政黨得票率與席次比較表

	民國78年	民國81年	民國84年
國民黨	66.1 (4)	50.8 (4)	29.7 (2)
民進黨	38.6 (2)	31.1 (3)	36.2 (4)
新黨	無*	無	28.7 (3)
無黨籍		18.1 (2)	
總席次	6	9	9

* 民國78、81年立委選舉時新黨並未成立。

資料來源：(1)民國78年與81年資料整理自選舉實錄。

(2)民國84年資料整理自聯合報第14版，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三日。

一、社會網路位置類型的建構

爲了要了解選民被動員的情形，我們將選民分為三類：動員者，被動員者及不被動員者³。我們假設，動員者應為『意見領袖』，擁有相當高的政治知識，且對於傳播政治資訊有興趣，他們常常主動與週圍認識的人建立關係。被動員者則是對政治較為疏遠，但是並不會排斥選舉期間的政治訊息。由於他們缺乏了解政治的動機與能力，所以他們只是單純的接收訊息者，被團體或個人所動員投票(Flanagan, 1991:173)。不被動員者則是完全與政治訊息隔離，他們雖然不盡然排斥政治，但是他們對政治的興趣實在不高，連帶的使得他們接收不到政治的訊息，但是他們究竟有沒有高的政治知識需要進一步確定。

我們的分類是否成功尚待後面的分析來證實，不過我們可以從與其他年度的選舉的資料比較中，看出這種分類應是可以接受的。我們找出民國八十一年份的資料，且增列日本在一九七六年的國會選舉資料做為參照。在表3中，民國七十八年比八十一年份的被動員者比例多了一點六個百分點，而不被動員者少了八點六個百分點，不過我們在動員者的資料未補足前無法解釋不被動員者的增加原因。而日本的一九七六年選舉資料中，不被動員者的比率與本研究資料相當接近，相差不到一個百分點，而動員者多了七點七個百分點，被動員者則少了八點五個百分點。我們相信日本選民較台北市南區的選民更為

主動地傳遞訊息，但是社會網路還是很有限，無法網羅更多的選民。

表3 民國78年、81年北市南區立委選舉及1976年日本國會選舉動員類型比較表

	民78年立委選舉	民81年立委選舉	1976年日本國會選舉
動員者	45 (6.3)	無*	212 (14) **
被動員者	342 (47.5)	404 (45.9)	601 (39)
不被動員者	333 (46.3)	476 (54.1)	723 (47)
總計	720	880	1536

* 資料來源為自該次問卷並未問及受訪者有無為人拉票。

** 轉引自Flanagan(1991)，頁168。原來的資料將選民分為積極動員者、偶爾動員者、接受動員者及未接受動員者，我們將前兩類併為動員者。

就本研究的主體七十八年台北市南區的選民而言，僅有6%的選民是動員者，這個數字乍看之下似乎偏低，然而我們若將被動員者的比率相較，等於每個動員者最多可影響到八個被動員者。也就是說，台北市南區的選民中可能出現『一人拉八票』的動員模式。若我們考慮不被動員者中也有實際上被動員者，以及扣除重覆動員的部份，一個意見領袖可能代表九張選票，這種動員效果應是相當可觀。

二、社會網路位置類型的背景分析

不同網路動員類型的選民，有著什麼樣的差異，自然是我們的關心重點。在我們所檢閱的文獻中，學者們一致指出，由於選民較易信賴與其身份地位相近的人，因此意見領袖與被動員者之間應無太大的社會背景差異。然而在政治態度上，由於意見領袖扮演傳遞自大眾媒體得到之訊息角色，因此意見領袖必定較其他選民有較高的政治興趣及政治知識 (Flanagan, 1991:166-167)。

表4的結果部份地證實我們的假設。在受教育年數方面，不被動員者的受教育年數明顯偏低，動員者與被動員者的教育程度較高，顯示社會網路的參與成員還是以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為主。而在受訪者自估的社會地位方面，三者均集中在中間地帶，差距很小，可見北市南區的選民的社會地位相仿。年齡方面，被動員者略為偏低於動員者，不過動員者的地位仍與年齡較長與否無關。

表4 三種社會網路類型的人口特徵平均數表：社會地位與年齡

	動員者	被動員者	不被動員者
主客觀社會地位			
教育年數	9.28	8.50	6.50
主觀社會地位	51.38	53.39	48.24
生命週期			
年齡	42.09	37.94	43.08
個數	45(6.3)	342(47.5)	333(46.3)

表5則是從性別及職業來觀察。男性除了較多成為動員者外，似乎也較多成為被動員者，女性則以不被動員者較多，可見男性選民較常接觸政治訊息。在職業方面，軍公教人員最多屬於動員者，農工及家庭主婦則有相當比例構成不被動員的選民，商人之中則有相當比例被動員。這項結果顯示，擁有人際網路及政治知識的軍公教人員與商人，較少不被動員，他們應該是社會網路的組成份子；相對的，農工及家庭主婦遠離了社會網路，他們正有待被整合進來。我們似乎可以看到，社會網路中的活動者屬於社會地位較高的，人際關係較好的選民。

表5 三種社會網路類型的人口特徵：性別、職業

	動員者	被動員者	不被動員者	顯著水準
性別				p<0.01
男	28(8.2)	173(50.9)	139(40.9)	
女	17(4.5)	169(44.5)	194(51.1)	
職業				p<0.005
軍公教	15(9.2)	77(47.2)	71(43.6)	
商人	16(5.7)	155(54.8)	112(39.6)	
農工	0(0.0)	11(30.6)	25(69.4)	
自由業	3(5.8)	25(48.1)	24(46.2)	
家庭主婦	6(4.5)	52(38.8)	76(56.7)	
無業其他	3(6.8)	19(43.2)	22(50.0)	
個數	45(6.3)	342(47.5)	333(46.3)	

由以上的基本人口變項檢視，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初步的印象，即動員者的特徵是男性，四十歲以上，高中以上教育程度，而被動員者與不被動員者的特徵尚非十分清晰。這三種類型的選民可以說分布在社會的各個階層，我們難以單純地以人口特徵來描述他們(Berelson, Lazarsfeld and McPhee, 1954:110; Flanagan, 1991:166)。

相對的，在各項政治態度指標方面，三種類型的選民之間的差異展露無遺。我們共設定了政治知識，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及里鄰信任感等四項指標，結果發現，選民在這四項指標上的差異顯著。在政治知識指標上，動員者的分數高於其他二者，可見政治知識的確是動員者的必備條件。不被動員者的政治知識偏低，可能是因為教育程度較低（見表5），加上不常接觸社會網路，所以不被動員者的政治興趣雖然不低，還是較被動員者缺乏政治知識。

表6 三種社會網路類型的政治態度平均數表：政治知識、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里鄰信任感

	動員者	被動員者	不被動員者
政治知識			
政治知識	2.77	2.48	1.93
政治興趣			
對選舉的興趣	3.88	3.32	3.43
看報紙選舉新聞	4.00	3.50	3.27
看電視選舉新聞	3.93	3.69	3.56
閱讀文宣	3.81	3.10	2.90
參加政見發表會	3.22	2.57	2.67
與別人討論選舉	2.26	1.53	1.16
政治效能感			
公眾事務參與*	48.95	50.51	57.20
里鄰信任感			
與鄰居往來**	33.40	31.03	40.40
個數	45(6.3)	342(47.5)	333(46.3)

* 問卷題目為：「公眾的事不好辦，所以最好不要插手」表格內數字越大越表示受訪者同意這句話。

** 問卷題目為「為了避免麻煩，鄰居間還是少來往比較好」表格內數字越大越表示受訪者同意這句話。

而在政治興趣方面，動員者在各項題目上領先其他兩類型的選民，但是領先的幅度不大，而不被動員者的政治興趣與被動員者的差距很小。三者最鮮明的差異在於與他人討論選舉的管道：動員者的討論管道比不被動員者多了一個。

接下來我們檢視政治效能感與里鄰信任感這兩項指標。我們發現，當受訪者被問到：『公眾的事不好辦，所以最好不要插手』時，不被動員的選民強烈表示同意，而動員型及被動員型的選民則持相近的看法。這個情形告訴我們，不被動員型的選民對於政治體系的不信任感是很高的，相反的，動員型的選民由於常常勸說他人投票支持某人，所以對於政治體系的運作有高度的熱忱。Flanagan(1991)指出，意見領袖不僅勸說他人投票，而且還帶給他人政治效能感(Flanagan, 1991:171)。我們師法Flanagan的做法，將動員者扣除掉，留下其他的選民，以其討論選舉次數與政治效能感做相關分析，結果得到0.20的係數，可見選民的網路訊息多寡與政治效能感相關。

為了更具體表現社會網路與選民的日常生活態度之間的關係，我們問受訪者對「爲了避免麻煩，鄰居還是少來往比較好」的看法，結果仍是不被動員者最同意這個看法，動員者同意程度略高於被動員者。何以動員者不會反對這句話？我們的解釋是，動員者之中有少部份人居住在政治氣氛較與其本身立場相左的地點，因此他們不一定十分信任鄰居，影響與鄰居往來的密切程度（盛杏媛，民80:130）。不論如何，被動員者顯然對於鄰居的好感是最高的，而動員者反而對於四周鄰居有些許的猜疑。

從以上的初步分析，我們已對三種類型的選民特質有一定的了解。爲了進一步觀察三種類型選民的特徵，我們將每個因素標準化，顯示三種類型選民在每一因素上的得點，藉以相互比較每個因素之間的重要性以及三種類型選民的特徵。

表7幫助我們可以很快地指出三種類型的選民的特徵。動員者的特徵是與別人討論選舉（標準化分數爲0.722）以及閱讀文宣（標準化分數爲0.563）等政治興趣。動員者在這兩項因素上均顯著高於其他兩種類型的選民。而被動員者則是年齡較輕（標準化分數爲-0.174）以及與鄰居往來（標準化分數爲-0.169），其他的因素均是在三種類型中的中間位置，顯示被動員者無論是人口特徵或者是政治興趣上均是屬於較中庸的階層。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公眾事物參與以及與鄰居往來的態度上，被動員者的態度較其他兩類型的選民來得積極。不被動員者的特徵是少與他人討論選舉（標準化分數爲-0.211）以及選舉興趣特別少（標準化分數爲0.022）。這三種類型的選民最大的區別無疑是與別人討論選舉，顯示我們對社會網路位置的定義並無問題。同時，教育年數與年齡也是另一個重要的區隔變數，年齡的Cramer's V值達到0.3。政治知識反而較不重要，Cramer's V值只有0.123。這一點和Flanagan(1991)的發現有些出入，Flangan的發現是政治知識或政治興趣較教育來得重要(Flanagan, 1991:167-168)。顯然教育在台灣社會的都市化地區仍

是有一定的高低落差，而對於不被動員者而言，這樣的落差造成他們沒有接觸社會網絡的機會。

表7 三種社會網路類型的特徵：教育年數、社會地位、年齡、政治知識、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里鄰信任感（標準化分數）

	動員者	被動員者	不被動員者	Cramer'V
教育年數	0.326	0.027	-0.091	0.129
社會地位	0.018	0.126	-0.148	0.183
年 齡	0.101	-0.174	0.167	0.327
政治知識	0.472	0.066	-0.150	0.123
選舉興趣	0.364	-0.069	0.022	0.118
看報紙選舉新聞	0.432	0.057	-0.117	0.123
看電視選舉新聞	0.231	0.036	-0.068	0.075
閱讀文宣	0.563	0.037	-0.113	0.132
參加政見發表會	0.401	-0.064	0.007	0.088
與別人討論選舉	0.722	0.060	-0.211	0.182
公眾事物參與*	-0.124	-0.110	0.130	0.189
與鄰居往來**	-0.015	-0.169	0.177	0.162
個 數	45(6.3)	342(47.5)	333(46.3)	

* 問卷題目為：「公眾的事不好辦，所以最好不要插手」表格內數字越大越表示受訪者同意這句話。

** 問卷題目為「為了避免麻煩，鄰居間還是少來往比較好」表格內數字越大越表示受訪者同意這句話。

*** 只有下面加畫直線的Cramer's V值達到顯著水準（Significance值小於0.05）。

最後，我們應用區辨分析確定三種不同類型選民的差異，即了解我們的原始分類究竟與自變數所預測的結果相同程度多高。區辨分析模式的做法是用幾個自變數構成一道線性函數，將每個個案(case)分配至不同的團體(group)中，使團體之間的差異對團體以內的差異達到最大。同時，我們可以知道這道線性函數內的自變數之間的比重為何，亦即了解將我們所要分類的人群中最大差異。我們所投入的變數是表7內的所有變數，以及性別和職業。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將選舉興趣、看報紙選舉新聞、看電視選舉新聞、閱讀文宣以及參加政見發表會的回答視為相等的分數，累加而成一個新變數，取名為選舉參與。由於我們有三個類型的選民，所以我們需要兩個函數來做分群，所得的結果表

示於表8：

表8：社會網路動員類型的區辨係數表

	區辨函數一（討論政治）	區辨函數二（人口特徵）
討論選舉	0.918	
教育年數	0.498	
政治知識	0.408	
職業（軍公教商=1）	0.260	
里鄰信任感	-0.245	
公眾事物參與	-0.199	
年齡		0.789
選舉參與		0.566
社會地位		-0.353
性別（男性=1）		0.201
固有价值	0.108	0.037
解釋變異數量	74.30	25.70
顯著度	p<0.05	p<0.05

* 本分析的區辨函數所使用的篩選變數標準是Wilk's Lambda，兩條區辨函數均達到顯著水準。表中所列數字為區辨的變數與典型區辨函數（canonical discriminant functions）之間的相關係數，按照係數大小排列。

表8共列出兩個區辨函數，只有第一個函數達到顯著水準，解釋變異量達到全部的74.30%，我們將之命名為政治興趣函數。在這個函數中，包含討論選舉、教育年數、政治知識、職業、里鄰信任感及政治效能感等變項，我們可以看到，討論選舉變項的影響較大，其次是教育年數。所以我們命名為討論政治函數。在這個函數中，討論選舉與教育年數分列一二位，顯示這兩個變數之間應有很高的相關。我們對這個現象的解釋是，教育越高的民眾，比較可能與他人討論政治，因為政治意見在台灣社會中，比較是中上階層的關心主題，而非一般人都會關心的主題。

第一道區辨函數的固有价值只有0.108⁴，代表這道函數所區隔的三個團體的團體間差異對團體內差異的比值只有0.1，團體內的差異還是相當地大，分類的效果並不太好。而這兩個區辨函數的正確判斷率為48.10%，並不十分理想，只比區辨前的判斷率高出15%，可見這三個類型之內的選民仍存有相當的異質性。相較於日本選民可用政治態度一項清晰的區辨，顯然台北市南區選民的動員類型還需要其他的資料來標識。

綜合檢討表5、表6、表7及表8，我們已經初步確認了三種類型選民的屬性。在社會背景方面，三種類型之中動員型選民的教育程度較為突出，不被動員型的選民教育程度最低，不過三者之間的社會地位與年齡差距有限。而在職業方面，動員者多屬於軍公教及商人。因此我們可以說，台北市南區的社會網路動員型態是略顯垂直地由上而下，動員者與被動員者的社會地位與年齡相仿，但是動員者受過較多的教育，職業聲望也較好一點。我們認為這個結論應該相當符合現實經驗。

其次，在政治態度方面，三種類型的選民在政治知識方面表現出由高至低的趨勢，動員者最高，不被動員者最低。而在政治興趣方面，動員者的指標最高，被動員者與不被動員者之間的差距不大。因此我們歸納出：「不被動員者的政治興趣雖然不低，但是由於缺乏與他人討論，所以其政治知識偏低」的結論。

最後，我們從政治效能感的高低排列，再一次證明，動員者是與整個社會網路緊密結合，而不被動員者則是採取疏遠的態度。而在里鄰信任感方面，不被動員者仍然敬陪末座，更加使我們確定他們疏離社會網路。

三、社會網路位置類型的政治參與

前面提到，政治效能感的高低受到接觸社會網路多寡的影響。在這個小節，我們即將要探討，不同社會網路類型的選民如何表現出政治參與的差異。

有關政治參與和社會網路的關係，Lazarsfeld等人(1944)曾經指出，交叉壓力(cross-pressure)會使得投票選擇的最後決定時間拖得很晚，但是如果選民對該選舉的興趣很高，亦可能使得決定時間提早。這兩項因素交互作用之下，交叉壓力升高的時候會抑制對選舉的興趣，從而延後投票決定的時間(Lazarsfeld Lazarsfeld, Berelson and Gaudet, 1944: 62)。因此，選民的周圍環境影響很大。Huckfeldt(1979)也指出，住在高社會地位的地點，會受到鄰居的鼓勵而前去投票(Huckfeldt, 1979:589)。根據盛杏潑(民80)對台北市南區的研究，鄰里關係好的選民傾向投給國民黨所配票的候選人。黃秀端(民84)及陳明通(民84)研究國內民眾的投票參與行為，亦證實了受到動員的選民有較高的選舉參與情形。不過陳明通特別發現，只有村里鄰長及幹事的動員才對投票率有顯著的差異(陳明通, 民84:17)。可見社會網路的確對政治參與有影響。

我們首先觀察到，受訪者在七十八年及七十五年兩項選舉的參與情形。表9所示，持續投票的情形從動員者至不被動員者由高至低下降，不持續投票則反是。被動員者及不被動員者皆有忘記上次是否投票之情形。動員者的持續投票行為印證了他們是高度參與政治體系運作的一群人，相反的，不被動員者表現出較低的參與感。

其次，我們檢視投票決定的時間。三類型的選民在未決定一項的比率呈現由高至低

的趨勢，與先前的持續投票情形相符合。動員者的決定時間最早，可能是因為他們最關心選舉，所以在接受選前面訪時僅有四成的人未決定。而不被動員者顯然是因為政治興趣低且沒有收到政治訊息，高達八成的人無法決定投票的對象。被動員的選民可能因為交叉壓力的關係而無法下決心，他們的意向很可能在選前一天才會確定。

表9 三種社會網路類型的政治參與：投票習慣、選前投票決定

	動員者	被動員者	不被動員者	顯著水準
投票習慣				p>0.05
持續投票	24(82.8)	187(77.0)	129(74.1)	
不持續投票	4(13.8)	40(16.5)	36(20.7)	
兩次皆不投	1(3.4)	7(2.9)	4(2.3)	
忘記上次是否投票	0(0.0)	9(3.7)	5(2.9)	
選前投票決定				p<0.000
國民黨	22(48.9)	99(29.0)	66(20.1)	
民進黨	5(11.1)	21(6.2)	8(2.4)	
未決定	18(40.0)	221(64.8)	255(77.5)	
個數	45(6.3)	342(47.5)	333(46.3)	

四、社會網路位置類型的政黨支持

如同大部份文獻的分析焦點，社會網路動員與政黨偏好的關係亦是本論文要回答的問題。根據Converse(1962)的理論，政治訊息多者的政黨偏好程度最強，而政治訊息少者在缺乏其他刺激時，最傾向投給他們以往所選的政黨。在綜合Flanagan(1991)的發現後，我們假設，動員者由於政治訊息最多，所以政黨偏好程度最強。而被動員者與不被動員者的差別在於政治知識，前者較高而後者較低，所以被動員者較不被動員者有可能改變投票選擇。若我們再考慮我們的研究對象——台北市南區的情形，在七十八年仍是一個國民黨佔優勢的地區，我們似乎可以大膽地假設，不被動員者應該支持執政的國民黨勝於民進黨，而動員者則因為多為軍公教人員，所以其政黨認同應屬國民黨無疑；被動員者的政治知識較高（見表6），有可能較喜歡民進黨。

表10 三種社會網路類型的政黨認同

	動員者	被動員者	不被動員者	顯著水準
政黨認同				p<0.01
支持民進黨	1(2.8)	6(2.9)	4(1.3)	
偏民進黨	2(5.6)	23(7.2)	11(3.6)	
都不偏	8(22.2)	133(41.6)	159(47.9)	
偏國民黨	11(30.6)	116(36.3)	94(31.0)	
支持國民黨	14(38.9)	42(13.1)	49(16.2)	
個數	36(5.4)	320(48.5)	303(45.9)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三種類型的選民，其投票參與的程度呈現明顯的差異。這個發現不僅印證了先前的發現，也提供了我們對於社會網路影響政黨支持方向的假設。

此外，在表10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被動員者在『都不偏』一項的比率最高，動員者最低。可見不被動員者的政治資訊缺乏，因而沒有固定的政黨支持對象。在支持民進黨比率均低的情況下，動員者較其他兩者更認同國民黨，這是由於台北市南區素為國民黨支持者集中的地區之故，能夠從事政治動員者多屬於國民黨。有趣的問題是，何以被動員者呈現民進黨支持者較多的現象？我們認為，除了政治知識不低外，民進黨支持者不一定容易為他人所辨別，而且在溝通情境中，屬於多數的政黨支持者往往錯認了對方的立場(Huckfeldt and Sprague, 1987:1212)。另一方面，不被動員者即使受到影響，是否會改變其政黨認同，由於資料所限，並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內。

既然不同類型的選民有不同的政黨偏好，那麼這些不同類型的選民投票的對象究竟為何，是我們所想知道的。為了了解其他的心理取向被控制時選民的政黨選擇，學者所肯定的幾項重要的決定投票的因素：政黨認同、議題態度、候選人形象(Campbell、Converse、Miller and Stokes, 1960; Markus and Converse, 1979)將被放入投票模型中。為了適合台灣的民意代表選舉情況，我們將候選人形象的答案歸併為政黨形象。另外在議題態度方面，我們選擇當時仍是政黨之間重要區隔的總統直選議題，並且由於此項議題在當時為民進黨首先提倡而國民黨加以反對，所以我們假設贊成直選者為傾向民進黨者，反之為傾向國民黨者。以下即為我們的預測模型：

$$V_{KD} = a + b_1(p) + b_2(n) + b_3(i) + b_4(pi)$$

方程式中， V_{KD} 表示選民的投票選擇， p 表示選民的政黨認同， n 表示選民的社會網路位置， i 表示選民的總統直選議題態度， pi 表示選民心目中政黨形象。由於依變項——投票選擇可歸併為二分類，因此我們採用對數線性參數(log-linear)模型中的「邏輯」(logit)模型，來估計社會網路類型的選民，在控制其他的心理變項後，其投票的方向與機率。表11即為我們的參數估計表，參數的效果在於預測每一方格的期望值影響力，即為模型中的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相關程度。此外，我們假定社會網路位置的位置不與政治傾向有直接的相關，例如政黨認同，所以我們的模型並未涵蓋兩個自變項的交互作用，僅有各個自變項與投票方向之間的關係。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從自變項中說明交互作用與依變項的關係。

表11 選民的政黨選擇對數線性模型參數估計表*

	log-linear參數(λ)		multiplicative參數(β)**		(β_1/β_2)odds值
效果(effect)	國民黨(λ_1)	民進黨(λ_2)	國民黨(β_1)	民進黨(β_2)	國民黨對民進黨
政黨選擇	0.869	-0.869	2.384	0.419	5.689
政黨認同					
國民黨	1.145	-1.145	3.142	0.318	9.880
中立	0.394	-0.394	1.482	0.674	2.198
民進黨	-1.539	1.539	0.214	4.659	0.046
社會網路位置					
動員型	0.671	-0.671	1.956	0.511	3.825
被動員型	-0.600	0.600	0.548	1.822	0.301
不被動員型	-0.071	0.071	0.931	1.073	0.867
總統直選議題					
贊成	-0.602	0.602	0.547	1.825	0.299
不贊成	0.602	-0.602	1.825	0.547	3.336
政黨形象					
國民黨較好	0.516	-0.516	1.675	0.597	2.805
民進黨較好	-0.516	0.516	0.597	1.675	0.356

* 模型的適合度檢定：卡方值(likelihood-ratio chi-square)為10.80，p值為0.701。

** multiplicative參數(β)為log-linear參數(λ)的anti-log值。

從log-linear參數(lambda)來看，社會網路類型中的動員者，在控制其他三個變項後，其投票方向是國民黨，被動員者是民進黨，不被動員者則意向不明。當我們將轉換成multiplicative參數(β)之後，我們得出選民投國民黨對投民進黨的機率 (β_1/β_2)。例

如，當一個選民具有國民黨認同時，投給國民黨的機率是3.142，投給民進黨的機率是0.318。而這兩個值的比值(odds)表示投給國民黨對投給民進黨的可能性。我們觀察表11得知，當控制其他變項的影響後，也就是如果選民有相同的政黨認同、議題立場及政黨形象時，動員型選民無疑比其他兩者更可能投國民黨（odds值為3.825），而不被動員者次之（odds值為0.867），被動員者最低（odds值為0.301）。動員者投國民黨的可能性是不被動員者的四倍（ $3.825/0.867$ ），是被動員者的十二倍（ $3.825/0.301$ ）。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政黨認同中立者其實是偏向國民黨的（投票給國民黨對投票給民進黨的odds值是2.198），間接支持了我們對不被動員者偏向國民黨的看法。總統直選議題與政黨形象亦有相當強烈的區隔效果：贊成總統直選的選民投給國民黨是不贊成直選的選民的0.09倍（ $0.299/3.336$ ），而認為國民黨形象較好投給國民黨的可能性是認為民進黨形象較好的選民的八倍（ $2.805/0.356$ ）。

我們還想進一步了解，當選民同時具有政黨認同和社會網路位置時，對於投票方向的影響如何。我們的估算方式是將這兩個變數內的odds值相乘再乘以隨機情況時的odds值。例如，具有民進黨的認同且同時是不被動員型的選民，其投給國民黨的可能性是投給民進黨的0.23倍（ $5.689 \times 0.046 \times 0.867$ ），具有國民黨的認同且同時是動員型的選民，其投給國民黨的可能性是投給民進黨的214.99倍（ $5.689 \times 9.88 \times 3.825$ ）。依此推算，政黨認同與社會網路位置的交互作用對投票選擇的關係如表12所示：

表12 政黨認同與社會網路位置的交互作用對投票選擇的可能性比值表

次序	網路位置	政黨認同	比值
1	動員型	國民黨	214.99
2	不被動員型	國民黨	48.75
3	動員型	中立	47.84
4	被動員型	國民黨	16.90
5	不被動員型	中立	10.87
6	被動員型	中立	3.75
7	動員型	民進黨	1.02
8	不被動員型	民進黨	0.23
9	被動員型	民進黨	0.06

由表12可以看出，政黨認同屬於民進黨的選民，不論網路位置為何，幾乎不可能投給國民黨，而政黨認同屬於國民黨和中立的選民，不論網路位置為何，強烈偏向投給國

民黨；顯示政黨認同對政黨選擇的影響還是較網路位置來得高。與表11的結果相同，當選民屬於國民黨認同者時，不被動員者比被動員者更傾向投給國民黨。這個現象的原因，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以上的分析回答了不同動員網路位置的選民的政黨選擇。雖然我們無法回答那一項因素影響選民的投票選擇最大，但是我們至少確定了不同網路位置的選民，其投票選擇方向與強度因心理因素而有差異，使我們更了解社會網路的組成份子。很遺憾的，由於願意回答被要求投給誰的選民很少，僅有四十五人，使我們無法探討選民究竟是否會遵照指示投票，所以我們必須另外尋找其他的方法來說明選民受到社會網路動員影響的程度。

肆、社會網路位置與政黨體系變遷

社會網路動員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是我們在這一部分的分析中所要處理的問題。受限於資料，我們無法用問卷調查的資料呈現。但是我們認為，從近年來台北市南區的政黨生態變化情形，或許可以觀察出社會網路的影響。我們認為，近年來該地區的政黨生態變化有很大一部份原因是選民的政治興趣發生改變，越來越多選民進入社會網路而被動員。而社會網路與選民的政治興趣之間的關連，無疑是相當密切的。我們用表13來表示。

表13 全體選民及三種網路位置選民的政治知識決定因素之多元迴歸方程式

	全 體	動員者	被動員者	不被動員者
教育年數	0.246	0.556		0.303
選舉參與	0.174			0.210
討論選舉	0.120		0.200	
常數	-0.020	-1.582		-0.226
解釋變異量(R-square)	0.102	0.310	0.050	0.125

說明：表中所列數字除了常數欄和解釋變異量外為Beta係數，Beta係數為自變數經標準化得來。該迴歸方程式採用逐項挑選變項進入法(forward selection)，由電腦依次挑選與依變項淨相關係數最大且F值為人為錯誤的機率小於5%的自變項進入模型中，在錯誤機率大於5%時停止。

選民的政治知識可能由教育程度與日常生活接觸政治訊息所決定，日常生活的接觸又可分成自己閱讀電視報紙等與他人討論。從表13可以看到，就全體選民而言，教育程度是最重要的政治知識高低的決定因素，Beta係數為0.246，其次才是選舉參與，最後才是討論選舉。但是當選民屬於被動員者或不被動員者時，被動員者的政治知識高低的決定因素變成有無討論選舉，不被動員者則還是教育程度。我們認為，不被動員者由於不處在社會網路中，自然較少從與他人討論中獲得政治知識。而被動員者的教育程度高低反而不影響其政治知識高低，這是因為被動員者其實多依賴與他人的討論得來政治知識，教育程度高或低並不影響其與他人討論選舉的行為。或許我們可以說，被動員者比較依賴從他人得來的消息，而不被動員者則是較依賴媒體或根本是以自己的心理所認定的政治知識。

由於不被動員者是全部選民中最多的一群人，我們必須特別注意他們的特質。我們認為，實際不被動員者的人數應該比我們所分類的少。從不被動員者的人口特徵來觀察，多屬於家庭主婦以及農工從業者（見表5），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曾被說服投票，但是說服的過程是隱晦的暗示，而非直接的要求，因此在回答這些問題時可能並未想到他人影響投票的情形，使得他們被歸類到不被動員的類型中。第二，雖然這些不被動員者的投票決定時間很晚（見表9），然而他們的確經常去投票。他們的投票決定過程又是如何呢？我們的初步觀察是，由於這些未被動員的選民接觸的政治訊息並不多，因此他們也不大可能根據議題投票，所以他們的投票依據可能是我們所未測量到的，比如說，候選人的個人形象。學者指出，國會選舉中的投票根據除了政黨認同以外，另外一個容易取得的投票根據是在任者的地位(Fiorina, 1989)，不過，我們還未在歷年投票結果中發現有利於在任者的證據（蔡佳泓，民85:32-34）。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這些不被動員者乃根據許多目前流行的看法而投票，例如目前國家的政治安定與否、社會風氣的平靜與否，此即「美國選民」的作者們所指出選民的第三和第四個政治意識形態的層次：「對當時社會的認知」(nature of the time)以及「完全沒有認知」(no issue content) (Campbell、Converse、Miller and Stokes, 1960:218-256)。對於依據這兩個層次做為投票依據的選民而言，由於政治資訊不足，他們對於政治的看法可能來自久遠以前的重大政治變動，或者是他人所流傳的某種信念，僅僅一兩種信念或資訊所造成的影響可能非常長遠，但是他們又不因此而認為自己認同某一政黨。

相對於不被動員者的不明確態度，被動員者的動向應是較有脈絡可循。從我們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動員者的教育程度及政治知識、政治興趣等皆屬於中上程度。因此他們的政治意向應由長期因素——政治心理以及短期因素——政治資訊所共同決定。短期因素的決定方向，取決於動員者的態度，而長期的心理因素，取決於選民本身的態度。我

們從第二部份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被動員者其實還是依據其政黨認同做投票選擇，只有被動員者的政治態度減弱時，才會依據動員者的指示投票。因此我們可以預見，被動員者的態度變化與否取決於他們是否保持原有的政治態度。

這樣的分析結果對於現在的研究者具有檢視政黨體系變遷原因的意義。Campbell等人(1960)發現，政治意識形態概念層次越低的選民，越容易背離所屬的政黨；他們也發現，概念層次低的選民佔了百分之四十的選民數，有可能成為改變選舉結果的一群人(Campbell、Converse、Miller and Stokes, 1960:263-264)。Converse(1962)也說：「不僅整體選民的政治資訊低落，而且那些最沒有政治資訊的人似乎主宰權力的平衡，亦即執政黨的更替不成比例地決定於他們的情緒」(Converse, 1962:578)。日本學者Miyake(1991)將選民分成「忠誠的政黨認同者」(loyal)、「對政黨無好感者」(negatives)、「沒有政黨認同者」(nonpartisans)以及「缺乏政治資訊的政黨支持者」(uninformed)，他指出「缺乏政治資訊的政黨支持者」多數是女性、農民，乃根據一些傳統的價值觀支持政黨，或者根據團體的認同而投票支持政黨，但是一旦所屬團體的支持對象發生改變，他們的投票選擇也就跟著轉變。而「對政黨無好感者」以及「沒有政黨認同者」則容易游移在不同但是意識形態相近的政黨之間，並不會固定支持同一政黨。因此這些人的態度轉變，往往會影響政黨體系的命運(Miyake, 1991:243-244,260)。而依照我們在第二部份的分析結果，不被動員者的政黨支持意向不明，被動員者則是較傾向民進黨，但是其中仍有許多人沒有政黨認同，他們的態度意向會在什麼情況下發生轉變？影響的程度又會多大？是值得我們關心的問題。

表14 民國78、81與83年台北市南區國民黨、民進黨與新黨的政黨認同分布表

	民國七十八年	民國八十一年	民國八十三年
國民黨	44.7	56.9	36.3
民進黨	6.5	16.5	15.1
新 黨			8.8
都不偏	48.8	26.6	30.1

資料來源：(1)民國七十八年的資料來自何思因(民80)，頁105。
 (2)民國八十一年份的資料來自劉義周(民84)，頁17。
 (3)民國八十三年份的資料來自陳文俊(民84)，頁70。民國七十八年與八十一年份的資料為台北市南區選民的資料，民國八十三年份的資料為台北市全市的資料。

近年來台北市南區所發生的政黨生態變化，似乎提供我們一個思考的方向。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在民國七十八年與八十一年所做的調查，台北市南區的國民黨的認同者從44%成長為56%，而不認同政黨者減少了22%（見表14），但是在八十三年年的台北市長選舉調查中，全台北市的新黨的認同比率已有8.8%，國民黨跌至36.3%，民進黨維持不變；同時新黨囊括百分之三十的得票率。我們認為，新黨崛起應該與社會網路中的不被動員者有關。在八十一年年的立委選舉中，國民黨在台北市南區提名形象良好的候選人，且以「安定，反台獨」做為訴求重點吸引選民，拿下四席勉強維持各政黨均衡的態勢。然而不久之後，新黨成立，候選人以鮮明的反台獨立場以及反對金權政治爭取原本支持國民黨的選民（謝復生、牛銘實、林慧萍，民84:81,87），南區的兩個國民黨籍立委也脫離國民黨加入新黨。對於傾向支持國民黨的選民而言，新黨提供另一個相似但是又有所區別的選擇。另一方面，資訊管道的開放吸引選民去了解政治。黃秀端（民84）指出，在台北市長選舉期間，地下電台的大量運用增強民眾的政治參與。陳陸輝（民84）則觀察到，國民黨的眷村票源動員能力正在下降中（陳陸輝，民84:104-106）。因此透過地下電台以及國民黨原有的動員網路，新黨不僅動員到原先在國民黨動員網路中的選民，而且改變了不被動員者的態度⁵。八十一年選舉中被國民黨動員成功的認同者並沒有在八十三年年的市長選舉對國民黨保持忠誠，反而大量流失到新黨。相對地，居於少數的民進黨既無法穿透國民黨的動員網路，又因為議題立場以及政黨形象與國民黨差異較大，影響不被動員者的機會可說是非常小。在市長選舉中，民進黨的獲勝應該歸功於候選人形象（林錫興，民84:121），而第三屆立委選舉中民進黨的得票率其實並未比七十八年增額選舉高（見第二部份的分析），能夠拿到四席應該是因為支持者配合該黨提出的配票規則。

總之，我們發現台北市南區的國民黨認同者一度被整合，但是在新黨崛起後又被吸引到新黨陣營。而根據我們所做的社會動員位置類型的分析，我們認為這些改變政黨認同的選民正是在以往是不關心政治也不被政黨所動員，亦即我們所稱的「不被動員者」。我們尚無法適當地解釋選民被動員的過程——這是我們在文章一開始便承認的。不過從台北市南區的變化過程來看，選民應是在政黨菁英的刺激和資訊管道的快速變化影響下，改變政治參與態度以及認同的對象。

伍、結論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比較不同的社會網路位置類型選民的背景及政治態度，附帶討論社會網路機制的作用過程。我們將選民分成動員者、被動員者以及不被動員者。這三

個類型的相對社會地位分析顯示，三者的社會地位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教育卻有明顯的差距，說明台北市南區的動員方式應屬於略顯垂直的動員，也就是地位類似但是教育程度有差距的選民之間有動員的關係。不同社會網路位置的選民，在政治態度方面也有所差異，不被動員型的選民對於政治體系的不信任感是很高的，相反的，動員型的選民由於常常勸說他人投票支持某人，所以政治信任感較高。但是動員者並不因此相信他人，反而被動員者是最相信人的。動員者的持續投票行為印證了他們是高度參與政治體系運作的一群人，相反的，不被動員者表現出較低的參與感。而在政黨支持方面，動員型的選民強烈支持國民黨，被動員型的選民則有部份傾向民進黨，不被動員型的選民則較傾向中立以及國民黨。

根據第二部份的分析，我們發現，社會網路類型中的動員者，在控制其他三個變項後，其投票方向是國民黨，被動員者是民進黨，不被動員者則意向不明。因此我們認為，國民黨的支持基礎應是動員者以及沒有受到動員的選民。

本文除了為選民的社會位置類型做定性分析，也試圖分析不同的社會位置會影響選民的政治態度與投票方向。從南區的政黨生態變化中，我們一方面為這個現象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也以這個現象補充我們對社會網路動員過程的認識。我們觀察到選民的政治興趣正在發生改變中，由於政治菁英的動員以及各種資訊管道的開放，使得選民參與政治的興趣提升。這其中有一些選民是以往很少被動員而且政治知識較少的。因此我們的看法是：如果有一大部份的選民改變他們對政治的認知，他們的動向有可能鞏固或者再度轉變這個地區的政黨生態。而社會網路位置分析正可以幫助我們預測政黨生態變化的方向與程度。

註 釋

- 註一：Huckfeldt(1979)將社會關係投票分為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與社會網路(social network)。研究社會網路投票的學者多從團體內同質化個人政治態度的角度切入，發現宗教，職業，階級等社會團體對於個人的投票行為，發生同化(assimilation)或參照團體(reference group)效果，使得團體內的投票方向趨於一致。可參照如Tingsten(1937)，Flanagan and Richardson(1977)等。研究社會網路投票的學者則側重個人如何自朋友，同事等個人主動建立的關係中得到政治訊息，從而受到影響而改變或維持其投票方向。可參照如Foladare(1968)，Huckfeldt(1983)，Huckfeldt and Sprague(1987，1988)，Weatherford(1982)等。
- 註二：黃秀端（民84）視為人拉票為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為之一，在她的模型中，為人拉票是被解釋項。
- 註三：動員者的測量方式為「自己曾為候選人拉票」，被動員者的測量方式則為剔除拉票者後，在受訪者認識的鄰居，朋友及家人中有為人拉票或是鄰里長曾來拉票，皆計入被動員者的類型中。不被動員者即為以上兩種行為均無的選民。特別註明，『鄰里長曾來拉票』是選後電訪的題目。之所以要以受訪者認識的鄰居，朋友及家人中有為人拉票或是鄰里長曾來拉票，做為被動員者的定義，乃因為受訪者被問到以上這些人是否有拉票的行為時，極可能是根據自己無被這些人拉票的經驗來回答，這個想法乃依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在該研究計畫的結案報告中的說明。研究報告指出，採用這個做法的理由是為了兼顧受訪者的回答意願以及題目的效度。請參見盛杏媛（民80），頁123。
- 註四：參考Flanagan(1991)及Richardson(1991)的討論。見Flanagan(1991)，頁166，以及Richardson(1991)，頁348至頁354。
- 註五：有關黃復興黨部的輔選成效，可參考聯合報，「八上三下，黃復興黨部確已鬆動」，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三日，第四版。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份

林錫興

民84 「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因素」。收錄於選舉行為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從八十三年省市長選舉探討。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頁102-121，計畫編號：NSC 84-2414-H-001 B2，陳義彥主持，民國八十四年出版。

何思因

民80 「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因素：一個理論模式的探索」。收錄於台灣地區選民的投票行為：一個理論模式的探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頁98-116，計畫編號：NSC 79-0301-H004-12，陳義彥主持，民國八十年出版。

陳文俊

民84 「國家認同與民主化」。收錄於選舉行為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從八十三年省市長選舉探討。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頁49-89，計畫編號：NSC 84-2414-H-001 B2，陳義彥主持，民國八十四年出版。

陳明通

民84 「社會關係網路與投票取向：民國八十二年台中市長選舉的分析」。發表於國科會「政治學門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

陳陸輝

民84 中國國民黨黃復興黨部輔選效果之研究。政大政治所碩士論文。

黃秀端

民84 「選民為何參與競選活動」。發表於「戰後台灣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

盛杏媛

民80 「社會系絡與選民的投票行為」。收錄於台灣地區選民的投票行為：一個理論模式的探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頁117-171，計畫編號：NSC 79-0301-H-004-12，陳義彥主持，民國八十年出版。

蔡佳泓

民85 立法委員的選民服務之個案研究。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劉義周

民84 「政黨認同的分布」。收錄於台灣地區選民投票行為之研究：從第二屆立法委

員選舉探討，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頁16-20，計畫編號：NSC 82-03 01-H-004-033，劉義周主持，民國八十四年出版。

謝復生、牛銘實、林慧萍

民84 「民國八十三年省市長選舉中之議題投票：理性抉擇理論之分析」。選舉研究，第二卷第一期，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出版。

二、英文部份

Berelson, Bernard R., Paul F. Lazarsfeld and William N. McPhee

1954 *Voting: A Study of Poinion Formation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Converse, Philip E.

1962 "Information Flow and the Stability of Partisan Attitud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6(Winter 1962), pp 578-599.

Ennis, Philip H.

1962 "The Contextual Dimension in Voting." in William N. McPhee & William A. Glaser (eds.) *Public Opinion and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chap. 6.

Fiorina, Morrris P.

1989 *Congress: Keystone of the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2nd ed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Flanagan, Scott C., and Bradley Richardson

1977 *Japanese Electoral Behavior: Social Cleavages, Social Networks and Partisanship*. Sag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ociology Series, no. 06-024. London: Sage.

Flanagan, Scott C.

1991 "Mechanisms of Social Network Influence in Japanese Voting Behavior." in Scott C. Flanagan et al. (eds.) *The Japanese Vot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143-197.

Foladare, Irving S.

1968 "The Effect of Neighborhood on Voting Behavio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3(November): 516-529.

Huckfeldt, Robert R.

- 1979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Neighborhood Social Contex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No. 3. pp.579-592.

Huckfeldt, Robert R. and John Sprague

- 1987 "Networks in Context: The Social Flow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1. No. 4. December. pp.1197-1216.

Lazarsfeld, Paul F.,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 1944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rkus, Gregory B. and Philip E. Converse

- 1979 "A Dynamic Simulations Equation Model of Electoral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3: 1055-1070.

Miyake, Ichiro

- 1991 "Types of Partisanship, Partisan Attitudes, and Voting Choices." in Scott C. Flanagan et al. (eds.) *The Japanese Vot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226-264.

Richardson, Bradley M.

- 1991 "Social Networks, Influence Communication and the Votes." in Scott C. Flanagan et al. (eds.) *The Japanese Vot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332-366.

Tingsten, Herbert

- 1963 *Political Behavior: Studies in Election Statistics*. Trans. Vilgot Hammarling. Totowa, N. J.: Bedminster.

Weatherford, Stephen M.

- 1982 "Interpersonal Network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6, No. 1(Feb), pp.117-143.

附錄：問卷題目

一、政治參與

- 1.現在選舉正在進行，請問您對這次選舉有沒有興趣？是很有興趣？有一點興趣？不大有興趣？還是完全沒有興趣？
1.很有興趣 2.有一點興趣 3.看情形 4.不大有興趣 5.完全沒有興趣
9.不願回答
- 2.報紙上的選舉新聞，有些人看得很仔細，有些人沒有時間看，您自己對報紙上的選舉新聞，是看很多，看一些，不大看，還是完全不看？
1.看很多 2.看一些 3.看情形 4.不大看 5.完全不看 9.不願答
- 3.您看電視上的選舉新聞，是非常注意，有些注意，不大注意，還是完全不注意？
1.非常注意 2.有些注意 3.看情形 4.不大注意 5.完全不注意 9.不願回答
- 4.候選人的宣傳單您看不看？是看很多，看一些，不大看，還是完全不看？
1.看很多 2.看一些 3.看情形 4.不大看 5.完全不看 9.不願答
- 5.您喜不喜歡聽政見發表會？是很喜歡，有些喜歡，不大喜歡，還是完全不喜歡？
1.很喜歡 2.有些喜歡 3.看情形 4.不大喜歡 5.完全不喜歡 9.不願回答

二、社會網路動員

- 1.您有沒有跟家人或親戚談論選舉？
1.有 2.沒有
- 2.您自己有沒有替候選人拉票？
96.沒有 97.有（候選人姓名） 99.拒答
- 3.您的家人或親戚中，有沒有替候選人拉票的？
96.沒有 97.有（候選人姓名） 98.不知道 99.拒答
- 4.您有沒有跟朋友或同事談論選舉？
1.有 2.沒有
- 5.您的朋友或同事中，有沒有替候選人拉票的？
96.沒有 97.有（候選人姓名） 98.不知道 99.拒答
- 6.您有沒有跟您的鄰居談論選舉？
1.有 2.沒有

7. 您的鄰居有沒有替候選人拉票的？

96. 沒有 97. 有（候選人姓名） 98. 不知道 99. 拒答

8. 請問您三年前，就是民國七十五年的立法委員選舉，您有沒有投票？

1. 有 2. 沒有 3. 無投票權 4. 忘了 9. 拒答

三、政黨表現

1. 請問您滿不滿意國民黨一般的表現？

1. 非常滿意 2. 滿意 3. 差不多 4. 不怎麼滿意 5. 非常不滿意 8. 不知道
9. 不願回答

四、政黨認同

1. 這兩年來常聽一些人說自己是「國民黨的」、「民進黨的」，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國民黨的，民進黨的，還是其他政黨，或者都不是？

1. 國民黨的 2. 民進黨的 3. 都不是 8. 不知道 9. 不願回答

五、政治效能感

1. 公眾的事不好辦，所以最好不要插手？（以1到10表示）

98. 不知道 99. 拒答

六、里鄰信任感

1. 爲了避免麻煩，鄰居間還是少來往比較好？（以1到10表示）

98. 不知道 99. 拒答

七、選前決定的投票人選

1. 在立法委員候選人中，您有沒有決定要投給誰？

（候選人號碼） 97. 還沒決定 98. 不知道 99. 拒答

八、政治知識

1. 請問您立法委員幾年選一次？

1. _____年 8. 不知道 9. 不願回答

2. 請問您戈巴契夫是那一國的領袖？

1. 是_____ 8. 不知道 9. 不願回答

3. 請問您中共總理是誰？

選舉研究

1. 是_____ 8. 不知道 9. 不願回答

4. 請問您最近辭職的部長是誰？

1. 是_____ 8. 不知道 9. 不願回答

5. 請問您監察委員是由誰選出來的？

1. 是_____ 8. 不知道 9. 不願回答

6. 請問您現在的民進黨主席是誰？

1. 是_____ 8. 不知道 9. 不願回答

論文審查結果及意見：

一、審查意見一：

1. p.6 如何已經控制都市與鄉村的差異對於網路動員的影響？似有略加說明之必要。
2. p.8 引用日本國會選舉資料，並未表明是否與台北市南區有對等性，似應說明清楚。
3. p.9 “意見領袖必定較其它選民有較高的政治興趣及政治知識”有待質疑，尤其是政治知更有商榷之餘地。
4. p.12 “動員者的討論管道比不被動員者多了一個”，“不被動員者的消息來源只有一個”敘述事實與推斷有可議之處。
5. p.14 “由於缺乏與他人討論，所以其政治知識偏低”有此邏輯關係？
6. p.19 “政黨認同中立者其實是偏向國民黨的”缺乏實證說明。
7. p.10 (Berelson, 1954:110), p.14(Lazarsfeld et al., 1968:150-157)參考資料均未列出，應予補足，以方便查考。

二、審查意見二：

1. 表四與表六的ETA statistics可能與所規定的分析層次(ordinal interval)有不符之處，或應改用其他的係數表示較為恰當。
2. 表五，表八，表九中列出顯著水準，卻沒有列出相關係數。
3. 表七的區辨係數表並沒有說明統計過程中所使用的Method。
4. 動員者的N只有45，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個數，作統計分析有很大的問題存在，但本文卻以之作爲分析動員者的基礎，可能產生系統性的誤差。
5. 作者對社會網路類型的建構，分爲動員者，被動員者，與不被動員者，以是否爲候選人拉票衡量是否爲動員者，以鄰居，朋友，家人爲人拉票者爲被動員者，其餘爲不被動員者。這其中尤其是被動員者的定義相當粗糙，作者須要花些時間加以合理化。
6. 作者在分析各類型的特質時，有誇大相關性的嫌疑。例如表四與表五所列各獨立變項，僅有教育年數較有意義，其他皆難以判別，再加上動員者個數僅有四十五，實在難以得出頁九與頁十的結論。
7. 在作政黨偏好分析時，作者也忽略了支持民進黨與偏民進黨者的N也僅有五十七的事實。以一九八九年的資料作政黨偏好分析的一個相當大的問題，是支持民進黨者仍然沒有在資料中完全表達出來，以此有限的個數作爲分析的基礎，可能會有系統性的誤差，作者應加以說明。

8. 此外，較不明顯的問題，在頁八第九與第十一行的數字與圖表所顯示者有些微出入，宜精確一些；表九(頁十六)都不偏不被動員者的個數顯然有誤。

建議作者應再作修正與補充說明，讓本篇論文能夠更完整更具說服力。

論文評審意見的答覆：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意見，筆者已經做了盡可能的修改。在第一位評審的意見部份，筆者在文章內以數字說明了政黨認同中立者是偏向國民黨的看法，意見領袖必定較其他選民有較高的政治興趣及政治知識也已在文章內補引學者的看法以資證明。其他的問題筆者也已在文章內補充說明。

而在第二位評審的意見部份，筆者在文章內做了必要的說明。例如表四和表六的相關係數已改放到表七，而且改成Cramer'V係數。根據而表五、表八（已改爲表九）及表九（已改爲表十）之所以沒有列相關係數，是因為筆者想討論的是三種動員位置的選民的個人特徵與政治態度有無差異，而非差異的大小，故筆者認爲不需要列相關係數。表八的區辨函數的方法以及社會網路類型的建構，皆已在文章內及註釋內加以說明。對表四與表五的解釋，以及表十的數字，筆者也已做了適當的修改。

有關第二位評審所質疑的社會網路類型的動員型的個數，是否會因太少而影響到分析的正確性。筆者認爲，因爲筆者所用到的推論統計多以變異數分析爲基礎，例如迴歸分析與區辨分析，雖然這三組選民的平均值並不相等，不符合變異數分析的假設，但是按照統計學者的看法，這並不影響變異數分析的正確性。請參閱Neter, Wasserman and Kutner(1990, Applied Linear Statistical Models, Richard D Irwin, Inc.), 頁761-772。此外，筆者也以一些敘述統計的方式討論這三種類型的選民的差異。不過，個數太少自然在推論上面必須有所保留，這是筆者必須承認的。

有關民國七十八年的民進黨認同者個數太少的問題，筆者乃根據何思因先生在研究報告中所列舉的數據。

The Categor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ntext Position - A case study of the 1989 Legislative Election in the Second District of Taipei City

Chia-hung, Tsai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how that the social factor: the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 is discernible and important in the 1989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 of Taipei City South district. Traditionally, analysis of Taiwanese voting behavior focu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 Party identification which shed light on the stability of voting behavior was often highly emphasized. By inspecting the interviewees' frequency of contacting and discussing with their friends or neighbors, it is identified three locations in the social network. In the analysis of electorate'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political involvement as well as knowledge, it is found that a vertical association of mobiliz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three locations. Party identification dominates in the process of vote decision, however, the vertical association help determine the formation of party preference.

This paper explains how the social network influence the electorate, by observing the party preference volatility in the Taipei City South District. It is concluded that a part of electorate, who has not strong party preference, is changing their preference while old social network was replacing by new media and taking over by astute elite.

Keywords: social network, canvass, vote choice, party system